

《寻枪》:警察文化的寓言

丁 灿

(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长沙 410138)

摘 要:电影《寻枪》在当前繁多的公安题材影视剧作中与众不同。它不仅讲述了警察马山寻枪的故事,而且通过寻枪的行动,完成了对警察生存境遇包括权力和体制的反思,完成了对警察生命价值的审视和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从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工具理性的四个维度对警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因此,电影《寻枪》成为了指涉警察文化的寓言。

关键词:《寻枪》;警察文化;警察体制;警察精神;公安题材

《寻枪》,这部 2002 年由华谊兄弟太合影视投资有限公司、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电影,它的成功表现在:应邀参加第 55 届戛纳电影节的展映,并吸引美国哥伦比亚公司以 150 万美元(约合 1200 万人民币)的价格购买了本片的海外发行版权,大大超过了摄制成本的收益,取得了商业运作上的成功。影评上,由陆川编剧的该剧剧本未开拍时,就在中国台湾获得了“优良剧本大奖”。有影评人认为它“有个人表达,有商业考虑,是在良性基础上运作出来的”“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好看的电影。”^[1]这部电影在影评界和商业上的双丰收使得它在当代中国公安题材电影中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在《寻枪》的文本中,“警察”与“枪”这两个符码极其重要。它们贯穿整个电影文本本身,在画面和语言中反反复复出现。也因此,它所构成的当代警察的叙事,在当前繁多的公安题材影视剧中显得与众不同。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公安题材影视剧注重为观众讲述一个犯罪与惩罚、隐蔽与追踪的对抗性故事,在具曲折性与惊险性的表述中完成对警察故事的叙述,这些文本主要通过行动符码来展示现实世界的表层结构。但《寻枪》却建构了两种符码,一种是由警察马山的寻枪过程构成的行动符码,一种是通过寻找的行动指向深邃的心灵,展示马山在自我救赎中精神历程的表意符码。^[2]行动符码是表意符码的基础,表意符码是使行动符码获得自身价值的内核。在这两类符码中,表意符码指称警察的内质,在深层的精神世界里为我们展示了警察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义。因此,电影《寻枪》成为指涉警察文化的寓言。

一 枪与警察是一对互为确证的关系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禁枪的国家而言,枪是一个引人注目

的物件。合法持有枪支的只有军人和警察。军人的枪支在战场上打响,而警察的枪支却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因为犯罪情形往往是在日常生活中出其不意地发生。这种在有着日常性特点的犯罪现场用于对付犯罪者的致命常规警用武器,成为它的持有者——警察的重要标志。警察可以使用枪支警示犯罪者、阻止犯罪者、甚至击毙犯罪者。这样,二者的权力关系在此彰显了出来:基于枪支的功能,警察保有其对犯罪者产生控制效果的能力。这是一种基于武力的权力形式,是限制犯罪者自由的物理障碍。它通过使罪犯肉体遭受痛苦或损伤的刑罚,包括生命本身的毁灭以及基本生物学上需要的破坏而实现警察的意志。^[3]这种权力形式是警察为使国家、集体或普通人在免受侵害的过程中才能施与的一种武力,因此警察用枪具有合法性的前提。而不具有警察身份的人拥有枪支则被视为非法,他或她基于枪支的能力不是武力而是暴力的象征,是定为有罪的情形。

因此,枪与警察是一对互为确证的关系。《寻枪》中“警察马山的枪不见了”的情节架构,正是对枪与警察关系的一种检验。警察马山在妹妹的婚礼上喝醉了酒,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的枪不见了。从这一时刻开始,马山就陷入了黑暗的心灵深渊。他怀疑身边的每一个人,怀疑一切可能的情形,他怀疑他的手枪在儿子的书包里或保险柜里,希望手枪与战友老树精有关,与突然回到小镇上的初恋情人李晓萌有关,与和李晓萌同居的情人周晓刚有关,与卖羊肉粉的刘结巴有关,与一个街角的陌生女人有关,与一群放学的孩子有关,他甚至对一个手持假枪而不是真枪的小偷大发雷霆……找到手枪成了马山唯一要做的事情。

此时,枪不只是一个实体性的物件,枪基于枪的功能使

收稿日期:2009-02-18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提升警察文化软实力的中国公安文学研究”(08YBB289);2008 年度湖南省公安厅资助科研项目“提升警察文化软实力策略研究”

作者简介:丁 灿,女,湖南湘乡人,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写作理论。

警察保有对犯罪者使用武力的权力。因此,枪的丢失就显示出更多的存在论上的意义。丢枪之后的马山被局长下令收缴了警服,勒令离开派出所。当马山脱下警服,只穿着短裤从派出所长长的阶梯走出时,正意味着他开始远离警察身份,成了一个被放逐的个体或一个孤独的漂泊者。在马山的警察身份被解构的同时,他的其他身份认同也受到了质疑:他不能完成一次平常的性事,妻子晓云说:“你有问题”;他的儿子在他被拘留的时候说:“我会想办法帮助你的,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以后不许打我。”丢枪事件发生之后,马山在家里的男人身份和父亲身份似乎也被消解。

马山因为枪的丢失,作为整体的人的天然关系被改变。所以,枪作为行动符码这个现实世界之物,构成了警察马山寻枪行动指向的对象。在表意符码里,它是一个增值了的权力符码,它和警察构成一种想象性关系,是马山一切体验的中心。所以说,枪在某种情形之下构成了对犯罪者的奴驭,却在整体意义上构成了对警察的压制。这种压制的作用在文本里表现为通过枪的引领,警察马山完成了一次对自己全部人生的反思。枪,在此指向的是一种警察基于权力之上的道义与责任,是警察不断追寻的终极意义。只有找到枪,马山才能完成他在社会体系中的责任,同时也就完成了作为一个男人、一个父亲、一个警察的责任。正如电影文本在它的结尾所表述的:马山假扮凶手的目标周晓刚以引蛇出洞。凶手刘结巴果然跟踪而至偏僻的火车道旁,他用马山手枪里的子弹在马山身上洞穿了两次之后,被马山抓住。电影的最后是已经牺牲的马山,在警察们赶到案发现场时从地上站起身,提着枪走在大路上,在蓝天白云的背景下发出了最后一声如释重负的笑声。电影用幻想的抒情方式描述了马山终于用生命为代价找回了自己的手枪,抓获了杀人凶手,完成了一个警察找回手枪,也就是履行了自己的道义与责任,重新成为一个拥有合法性警察权力的警察的叙述。这样一个倒在凶手枪口下的警察英雄,马山也理所当然地恢复作为男人、和作为父亲的身份。

二 警察体制具有绝对权威

促成马山执着追寻自己丢失的手枪的动力源是警察体制。警察作为一个有着清晰边界的组织,其内部体制对全体警察自然具有严格的约束力。这些体制包括行动目标与方式、纪律和作风、奖励与惩罚等。《寻枪》的建构方式和价值意义指向,遵循着警察体制的规范。局长得知马山的手枪丢失后,立刻来到云凹镇派出所,并大发脾气:“20个小时,坐飞机可以到美国了,坐火车可以到北京了,坐汽车可以到省城了!如果到了北京,你给我们的国家会造成多大的损失!”“手枪里有三颗子弹,一枪一个,就是三条人命,遇到职业杀手,一枪两个,就是六条人命哪!”“星期五之前如果不把枪放到我桌上,你们都不要吃饭!”并宣布“马山可以回家了”。“马上排查昨晚出现在婚礼上的人,人手不够从县里调!”电影文本在它所述的图景中揭示了警察体制中的以下特征:

(一)警察体制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具有政治性与人民性。公安机关——自1949年始为保卫新生国家政权正式建立起

来的这一全新的政府职能机构,依法管理社会治安和侦查刑事案件,到21世纪的今天,其职能仍然是国家机器运作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公安机关的政治性与生俱来。同时,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政治性与人民性的同源共生的特点在警察体制内不断积淀、强化,形成了警察体制内的最大规训是“维护国家利益,保护人民安全”。为了更好地实现维护国家的利益、保护人民的安全的目标,警察被赋予合法地使用手枪的权力。手枪基于它的功能上的特殊性,一旦丢失,就对国家和人民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所以,“手枪找不到,饭也不要吃了。在公安局长的话语里,表明警察体制所维护的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安全一旦被某种不利的情形打破,就会对这一体制之内的警察形成巨大的压力,直到这种局面被修复为止。

(二)警察体制保有对警察权力的绝对权威性。警察的权力关系有两组,一组是警察与犯罪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一组是警察内部上级与下级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两组权力关系表征了警察体制的规范性力量。《寻枪》在警察体制的场域内从两组关系出发展示了警察权力的绝对权威性。一方面是马山和其他警察一起,抓住了行窃的小偷,破获了周晓刚的假酒厂,抓住了枪杀李晓萌的凶手刘结巴。这种警察对犯罪者实施的控制效果是自然的,是对现存秩序产生有益结果的权力方式,这种权力关系在观众中具有普遍的认同、支持。另一方面是警察内部上级对下级的绝对权威,这是依赖于警察等级不同而产生的权力关系。具有控制权的局长在丢枪事件发生后,能调配全县警力,处分马山,甚至可以剥夺“吃饭”的权力等等。面对局长的训斥,派出所所长、马山和其他警察默默听令的态度,表明了这种权力的绝对性。既不需要强制,也不需要说服,而被要求服从的警察都无异议地接受。上述两种情形体现了警察体制内的警察权力的合法性权威,它使警察体制保有了警察行动最大限度的有效性,并最终达成了马山以生命的代价如期完成了局长下令的寻枪任务。

三 警察精神的个体自觉

但是,马山在本文当中所处的这种长久而巨大的紧张关系,及最后的以身殉枪的结局决不是仅仅依靠警察体制的运作就能达成的,也不是枪所代表的警察权力意义所能指引的,而必须放置在信仰的框架内寻求合理化的方式。^[4]马山的行为是某种信仰和精神追求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力作用的结果。

马山在发现枪不见了的第一时间的高度紧张的表情,翻找家中的每一个角落的焦灼的行为,在头脑中幻想自己保险柜里一把闪闪发光的手枪的图示,显示了枪所承载的警察权力对于一个警察的特殊意义。而这种权力因枪的丢失使马山被迫退出了警察队伍,但他的一切却仍被这只丢失的枪所指引,他的生命存在就是为了找到这只丢失的手枪。所以,枪,既是客观的物,又是抽象的带有符咒性质的发自灵魂深处的召唤。

文本中两次表述了警察马山面对枪口的情形:在骑自行车

车追小偷时,小偷在无处可逃的悬崖边用枪打中了马山,马山中枪未倒,他摸着被击中的腹部绝望地咆哮:“怎么是假枪呢?怎么会是假的呢?这一情节就象是某种喻示,在文本的结尾处又以真正的中枪重复了这一情节:凶手从背后击中了假扮周晓刚的马山,马山转过身看见了自己的手枪时如释重负地笑了。他对凶手刘结巴说:“把枪还我。在马山的话语中清晰地表明,枪对于马山的意义远甚于他的生命。这种对警察马山在枪口下的视死如归,听从自己理想信念的召唤的叙述,诠释了警察精神:为了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警察可以牺牲自己,至死不悔。寻枪的过程,承载着一个警察对于警察理想的执著追求,展示了这个叫马山的警察的全部心灵,流露出警察精神中的宿命感与悲壮感。

四 工具理性的悖反

我们知道,当代警察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介入不断提升其科技实力,使警察们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工作中具有凌越犯罪手段的先进性。因此,警察叙事总是表现出警察对工具理性的依赖。《寻枪》中李小萌被杀的情节在周晓刚的表述中试图掩盖某些真相,但警察对现场的勘查揭露了他的阴谋,弹道分析的结果否定了周晓刚陈述的凶案发生的情形,李晓萌手臂上的伤痕进一步揭示了周晓刚说谎的动机,生死关头,李晓萌被情人周晓刚推出,挡住射向周晓刚的子弹。警察借助技术的作用揭开了案件的真相,工具理性成了引导警察行动的主要构成力量。但是,这种工具理性并不是处处有用。

凶手刘结巴俯身查看被打中的人,发现并不是他想杀的周晓刚而是马山之后,他绝望地大喊:“怎么会是你呢?怎么会是你呢?”“我不杀你,我要杀周晓刚,他的假酒喝死了好多人啊,我家里人就是喝他的酒死的,我要报仇,我要杀了周晓刚,你们要证据我不要证据。这一句话从根本上揭示了工具理性的困境。在此,工具理性成了制约警察行动的主要构成力量,它甚至压制警察的主体性,使周晓刚这样的犯罪者一直逍遥法外,凶手原来是受害者。

文本中“防弹背心”这一符号反复出现,周晓刚拿着防弹背心一直紧紧跟在马山身后,一路劝说马山穿上防弹背心保护自己,但马山嗤之以鼻。马山最终以自己的生命捍卫了代表警察权力的枪,他中枪倒下的英雄之举完成了对“防弹背心”这一工具理性的批判。这一行动明显表现了英雄精神与工具理性之间的间隙:警察的英雄精神必然以勇于牺牲来定义,而工具理性只产生无价值的生命存在。假如马山穿上防弹背心,成功地找回自己的手枪,他就会重新卷入到无休止的与妻子、儿子、云凹镇居民的纠葛之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马山的形象就会重新汇入到普通人物的行列当中,他不再具备令人敬仰的英雄的品质。

电影《寻枪》从物质(枪)、制度、精神、工具理性这四个维度对警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讲述了一个表层结构的警察马山“寻枪”的写实故事,刻画了他在丢枪后的绝望中完成了对自己也是对警察生存境遇包括权力和体制的反思,完成了对警察生命意义的审视和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电影文本所表现的这种全面而深刻的对警察的观照,使之成为我们分析当下警察文化和建设警察文化软实力最为生动的案例。

参考文献:

- [1] 路海波. 中国电影名片快读 [M].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3: 360.
- [2] 王晓路,等. 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81.
- [3] 周 宪. 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00.
- [4] [美] 丹尼斯·朗. 权力论 [M]. 陆震纶,郑明哲,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责任编辑:骆晓会)